

回顾与展望中的中国基督教研究

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Past and Future

谢文郁

Xie Wenyu

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基督教与中国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举行。会议收到论文40篇，与会者约70人。论文涉及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对话，当代中国基督教教会现状研究，以及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思潮和基督教的对话等等。

一、进入生存分析的中国基督教研究

齐克果(Kierkegaard)在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法时指出，每个人都是生存物，因而不得不为他的生存关注所冲动。离开个人的生存关注，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人的生活 and 思想。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如果他不从人的生存关注开始，而只是在宣讲一些已定的理念或原则，那他最多不过是重复一些空话而已，根本无法进入人的生命。齐克果的这些想法在他的著述生涯中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为生存分析。这一方法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从生存分析角度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始终是比较欠缺的。而本次会议收到的已写论文，却展示了生存分析的深刻影响。

洛杉矶国际神学院院长唐崇怀博士在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历史性反思》的演讲中指出，全部问题归根到底乃是真理

和生命问题,离开人的生命来谈论任何理念和体系都是没有意义的。唐博士强调的是真理的自在和主动给予,以及人的生命在这接受真理中的改变。当然,生命概念在不同的生存关注中有不同的定义。当我们转向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中国人是以他们特定的生存关注作为基点来看待基督教的。我们需要深入到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生存关注中去,并在其中经历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在生命中把握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运作。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普林斯顿神学院陈尚仁的《胡适与基督教》,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的《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美国西部神学院郭俊豪的《唐代情境对景教翻译事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飏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以及北京大学宗教系吴玉萍的“赵紫宸神学思想的启示”等。

陈尚仁的论文追溯了胡适的早年宗教体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生存关注,并及这一关注对他成熟时思想活动的内在决定性。文章指出,胡适对生命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宋明理学的信仰体系,而外来的科学世界观只是“外衣”而已,并未深入到他的信仰之中。陈尚仁始终围绕胡适的生存关注来讨论胡适的思想运动,可以说是有意地运用了生存分析的方法。

相比之下,胡军对贺麟的基督情怀的讨论则更多的是理论陈述,即,罗列贺麟关于基督教的论述,并按目条整理分类。胡军提到贺麟在美国学习期间和基督徒交往的经历,贺麟强调精神基督徒的生命(分别机构教会和个人生命),并提出贺麟的儒化基督情怀的生存倾向,这些应该是我们进入贺麟思想活动的入口。实际上,离开贺麟的生存关注,他的许多关于宗教和道德的思想就显得紊乱。比如,贺麟为什么要为儒家伦理寻找宗教基础?如果儒家本身固有宗教精神,为何要引进基督教精神?

在西方当代思想界,由于当代人类学的发展,生存分析已经为

越来越多的学科所接受。郭俊豪关于景教经典翻译的讨论中便谈到一个很好的例子。郭俊豪指出,在以往学者研究景教经典翻译的著述中,人们沿用的是静态的“符号转换”概念。这一概念无法说明景教经典翻译对佛教词汇的使用,景教在汉语经典中的“混合教义”形象等等。因此,郭俊豪认为我们应作方法论上的转变,即借用“动态对等”概念。在“动态对等”中,我们便能够从历史、文化、语言的角度看景教经典的翻译。也就是说,景教经典的翻译方法,文字选用和译文形态都和景教教徒在唐朝情境中宣讲自己的教义直接相关。因此,景教经典的翻译必须追溯到翻译者的生存关注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翻译过程。

本次会议还收到了王飏关于传教士和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的文章。王飏提出了“近代中国传教士文化”概念,并运用这个概念来处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文人的一些文学写作和思想活动。吴玉萍关于赵紫宸神学思想的讨论则集中在赵紫宸的人格主义及道德神学方面,认为赵紫宸的神学有其现实关注,即使基督教能够真正有益中国人及社会。由于这一关注,赵紫宸的神学便带上浓重的人格主义倾向。王飏和吴玉萍的文章虽然仍然采用客观历史描述法,但也有某种生存分析法的影响。

二、中国的基督教研究状况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基督教在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吸引了一批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会议收到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朝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困境与文化取向》。文章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现状,探讨其内在的运动,并企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去体验并把握这一运动。上海东方研究所所长张绥教授在《1978—1999年中国大陆宗教状况之研究》中,对中国大陆近

20年的宗教活动与发展持积极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梅瑛则从资料收集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现状,让与会者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中文资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倪慧良在大会上回顾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基督教研究,他谈到,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的方法转变到人类学方法,从以西方为中心转变到以中国为中心,从重视西方传教士到重视中国的社会文化。美国富勒神学院李亚丁就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对基督教的看法和研究作了综述和分析,他认为,80年代以来,对基督教和西方传教士的研究和评价已不再被视为禁区,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仍非常敏感,对基督教持肯定态度或正面评价得文章和书籍仍不多见。与李亚丁的发言相呼应,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在其论文《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模式辨析》中指出,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评价,只能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实事求是。

三、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的基督教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论题之一,收到近20篇论文。总的来说,与会论文涉及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各个方面问题,包括基督教学术研究现状,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展望,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发展现状,基督教神学教育现状,以及基督教神学问题,等等。

中国神学建设问题是这两年来谈论较多的问题。本次会议收到两篇以此为主题的论文。一篇是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梁燕城的《建构性的后现代化中国神学》,另一篇是上海东方研究所李婉君的《爱的神学之构建与思考》。梁燕城在论文中强调中国与西方世界同时步入后现代时代,因而中国神学建构须以后现代社会

为基点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切身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神学,不是本色神学或处境神学,而是以中国文化与处境为核心思考的切入点,以西方神学的成果为参照点,基于圣经真理,用中国人的心灵去消化基督信仰,从事 21 世纪的神学创作。”李婉君则试图在“爱的神学”这一提法中为“三自”教会提供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

一些与会学者对基督教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讨。如庄祖鲲《从世纪末宗教热潮看宗教研究之必要》,李灵《基督教与未来中国:影响中国的可能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收到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让与会者对中国基督教现状有微观的了解。香港建道神学院副院长梁家麟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与基督教》,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刘家峰的论文《农业传教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回顾了新教传教士入华以来所做的农业高等教育,他们对农业传教重要性的认识,教会对农业传教的积极回应,以及农业传教的成果等。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朱晓红的《上海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介绍了新教华东神学院和天主教佘山神学院的现状,并对神学院工作面临的难点和现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姚西伊的发言《华北神学院:福音派神学教育重镇》,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院华北神学院由成立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追溯,同时对其教学特点做了深入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庸提交的论文是《北京基督教会缸瓦市教堂调查》,他分析了该堂所处的重要的地理、宗教、文化和政治位置,以及其社会影响,对该堂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教牧与信徒状况、宗教活动等也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与从外部因素入手分析研究基督教的传播和教会的发展有所

不同,这次会议也有一些论文是从基督教的内部因素入手,来探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的成长。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罗伯特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9世纪初美国对华宣教的背景》。介绍了历史的时代背景,讨论了这一运动的神学动机,以及英美两地的灵性复兴运动,并从这些基督教内部的因素入手,探讨美国的对华宣教运动。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研究员王忠欣博士在《中国基督教的保守传统》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教会中信仰的主流/福音派信仰,并对这种信仰传统的形成及与教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本次会议给人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中国基督教研究已经开始分科。虽然这还仅仅是非常初步的。

四、基督教和哲学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基督教的排斥一直占主导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吴晓群的《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不同反应》,和美国密西西比更正神学院教授温以诺的《从非基同盟谈洋教与耶稣教的缘起与前景》,都追溯并展示了这一对抗。

在题为《后现代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的发言中,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王治河从后现代概念提出来的问题出发,指出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对后现代关注的忽视,认为中国基督教研究应当为后现代世界观的建立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本次会议还收到曾庆华的《诠释学与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他从“语言”,“诠释”,和“对话”三个角度探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走向,力度建立中国基督教的诠释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深《文明冲突与合作中的基督教化理与儒家伦理》一文,指出基督教伦理中的赦免意识对这一伦理规范也有关键的补足功能。

近些年来宗教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多元主义和排它主义之争。我们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迅速扩展。西方宗教学研究开始流行所谓的多元主义,即认为世界各宗教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真理,因而应该实行平等共存,互相对话交流。

多元主义的提出和流行隐含着两个基本的关注,即尊重各族文化和扩展自己的视角。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养成了一股强盛的西方文化优势情结。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对峙,文化侵略或霸权成了惯用手法。因此,当多元主义者提出尊重各族文化的口号时,便受到广泛赞同。同时,多元主义鼓励向各弱小文化学习,追求扩展本文化的容纳量,造就开放心态,这一点也很快引起共鸣。可以看到,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冲击西方文化中心论。

然而,多元主义在哲学上无法摆脱相对主义的阴影。于是,哲学上对相对主义的批评也适用于多元主义。这一批评的简单表述是:如果真理是相对的,那么,相对主义本身的真理性也是相对的。对于多元主义来说,人们问,多元主义本身作为一元,它如何能够确认其真理性的普遍性呢?多元主义的这一困境被揭示出来后,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冲击乃是对上述两点关注的冲击。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多元主义,如何能够尊重各族文化?如何能够在对等交流中扩展自己的视角?如何能够走向开放心态?由于这些关注在战后的冷战期间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因此,哲学上对多元主义的冲击便显得特别重要了。这次会议特别安排了一个有关多元主义和排它主义的专题讨论,共有三篇论文:谢文郁博士的《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多元主义与排它主义之争》,美国圣母大学访问学者刘宗坤博士的《排它论与宗教宽容》,富勒神学院陈志平的《多元与排它的困惑》。围绕着这三篇论文,会议展开了热烈讨论。

基督教学者宣扬基督教排他主义。他们的主要论证是,一方

面,任何宗教或文化在面对其它宗教和文化时,归根到底都是排他主义的。这一论证解决了所谓相对主义困境。另一方面,在谢文郁看来,他们从基督教的拯救概念出发,认为基督教排他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人们对各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关注,同时也能够带来开放心态。

刘宗坤则从权利概念的角度为排他主义辩护。他认为,如果人们有权利去相信非真理,那么,对于某一宗教信仰者来说,他既可以是排他主义者(只相信自己所信为真),同时又是宽容主义者(允许人们相信非真理)。从哲学上看,刘宗坤的讨论从“权利”出发,把权利当作某种给定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排他主义置于权利概念基础之上。但是,权利是非常复杂的概念。特别是近代以来,权利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广泛使用;从权利概念出发无异于把宗教置于政治之上。